

邵炳军 梅军 撰 上册

左氏春秋文繁年注析

董乃斌题

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秦文系年注析系列丛书

《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

（第三卷）

上册

邵炳军 梅 军 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邵炳军,梅军 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33-7832-6

I. 左… II. ①邵…②梅… III. ①中国-古代史-春秋
时代-编年体②左氏春秋-注释③左氏春秋-研究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957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30 字数:64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5.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导 言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是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一、《左氏春秋》概述

1. 《左氏春秋》的书名、编撰体例

昭公二年《左传》：“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①《国语·晋语七》载晋大夫司马侯对悼公问曰：“羊舌肸习于《春秋》。”^②《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对庄王问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③《墨子·名鬼篇》：“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汲冢琐语》记太（文）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可见，夏、商、周三代王室及周代鲁、晋、楚、燕、宋、齐等诸侯国皆有《春秋》。故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魏徵《隋书·李德林传》并引《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又，《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汉赵岐《注》：“此（指《乘》、《梼杌》、《春秋》）三大国《史记》之异名。”庄公七年《公羊传》何休《注》：“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管

① 昭公二年《左传》杜预《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案：从韩起所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语观之，其所见《鲁春秋》当为简策原本，必自周公旦、伯禽叙起；而今传世《春秋》叙事起迄唯春秋时期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等十二公之事，而西周时期周公旦、伯禽、考公、炆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等十五公之事皆无存。

② 《国语·晋语七》韦昭《注》：“《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

③ 《国语·楚语上》韦昭《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

子·法法篇》唐房玄龄《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魏徵《隋书·李德林传》载德林《答魏收书》：“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然则《乘》与《纪年》、《春秋》，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可见，《乘》、《春秋》、《纪年》、《春秋》、《史记》名异实同。故《春秋》本为夏、商、周三代王室及诸侯国史书之通名。

今传世之《春秋》，非昭公二年《左传》之《鲁春秋》之旧，实即《孟子·离娄下》之《春秋》，亦即《礼记·坊记》所谓《鲁春秋》，为传世鲁国史书之专名。传世《春秋》是我国现存文献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更准确地说是现存最早的大事年表。在《春秋》刚刚成书之时，由于人们对书中史实比较了解，所以，《春秋》经文虽简单到如史实提纲，当时士人却并不一定觉得非常不可解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其中所涉及的史事逐渐变得生疏，自然需要有解释本事的著作来帮助阅读，所谓“《春秋》三传”便应运而生。其中，《左传》一书，西汉前期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之为“《左氏春秋》”，《吴世家》称之为“《春秋古文》”，西汉晚期刘歆改称这部书为《春秋左氏传》（《汉书·刘歆传》），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之为“《左氏传》”，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称之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之为《春秋外传》），他们皆认为所谓《左氏春秋》是为阐释《春秋》而作，后世则简称为《左传》。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子夏门人公羊高所著《春秋公羊传》、穀梁赤所著《春秋穀梁传》，后人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刘歆传》：“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元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原序》、李廉《春秋会通·春秋诸传序》、明卓尔康《春秋辩义·卷首三》皆从之。唐刘知幾《史通·外篇·申左》：“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

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①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左氏》、明卓尔康《春秋辩义·传义》、唐顺之《稗编·春秋三·论三传》、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先正评说》、蒲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四、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三皆从之。清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其体有四：一曰无《经》之《传》。姑即隐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郑伯之车僂于济’是也。夫《传》以释《经》，无《经》则非《传》也，是《国语》也。二曰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如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事耳，岂似《传》体！以上录此《国语》居多，亦有刘歆窜入者。详下。三曰释不书于《经》之《传》。如元年五（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不释《经》而释不书于《经》，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诗》者不当释吴楚何以无《风》乎？彼《传》不然，则此非《传》也。四曰释《经》之《传》。务与公羊氏、董氏、司马氏、刘向之说相反而已。如隐三年书‘尹（君）氏卒’（《公羊传》）。“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张本也。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讥世卿”，为襄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张本也。虽使《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读之，当无异议矣。”在上引先哲的四条文献中，刘歆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春秋》三《传》“详略不同”，杜预所谓“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等“《传》之三体”，刘知幾所谓“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等《左氏春秋》“三长”之一，崔适所谓“无《经》之《传》”、“有《经》而不释《经》之《传》”、“释不书于《经》之《传》”、“释《经》之《传》”等“《传》之四体”，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概括了《左氏春秋》编撰体例，深得《左氏春秋》之旨。故就《春秋》三《传》的编撰体例而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三认为，“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吕思勉《经子解题》也认为，“唯《公》、《穀》述事，既仅取足以解经，语焉不详。生当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则《左氏》诚胜于二传”^②。

的确，《公羊传》、《穀梁传》以解释《春秋》的“大义微言”为主，颇多穿凿附会之处；其于史实虽有补充，且《穀梁传》有某些颇为精彩的叙述，但语焉不详者多。《左氏春秋》则是一部虽与《春秋》相配合，而又自成体系的史书，它也利用“《春秋》十二公”的世次作为记事线索，上起鲁隐公元年（前

①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三：“（啖）助之学，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意殊少；《公》、《穀》传经密于《左氏》。至赵、陆，则直谓《左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则唐啖助、赵匡、陆淳等皆褒《公》、《穀》而贬《左氏春秋》。

② 吕思勉：《经子解题》，页7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间的史实,比《春秋》多十三年,为我国第一部详细而完整地记载春秋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重大活动的编年体断代史书。《左传》绝大部分的内容与《春秋》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内容比《春秋》丰富得多,篇幅为《春秋》的十倍(18万余字)。其解释方法不同于《公羊》、《穀梁》二传。无论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超过《春秋》,也远非《公羊》、《穀梁》二传可比。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名著。当然,正如宋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五》所说的那样,《公羊传》、《穀梁传》也有其独特之处:“《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虽熟于事而理不明;公、穀出于经生所传,故虽深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

2. 《左氏春秋》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的作者与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十四说:

一为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前鲁左丘明所作说,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左传序》引《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①

二为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后鲁左丘明所作说,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②班固《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说大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魏徵《隋书·经籍志一》、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外篇·古今正史》、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

^① 孔氏所引《孔子家语·观周篇》乃据沈氏引严彭祖《严氏春秋》引文援引,严彭祖年辈早于司马迁,则《严氏春秋》引文所引为西汉初年本《孔子家语》,今传世[魏]王肃注《孔子家语·观周篇》本无此文。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贞《索隐》:“言约史记修《春秋》,去其重复之文也。”案:《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史记旧闻”之“史记”非书名,“因孔子《史记》”之“《史记》”为书名,即《春秋》。又,严彭祖以为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左传》乃同时之事,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在先而左丘明作《左传》在后,然皆以为《左传》乃左丘明所作。

明子孙姓氏论》皆从之。

三为鲁定公、哀公之世(前509年—前468年)左丘明所作说,刘宋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杻杙》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纪·孝和皇帝纪上卷》说同。

四为孔子门人续作说,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啖助传》引啖助之言曰:“其书(指《左氏春秋》)乃出于孔氏门人。……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刺,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引王安石《春秋解》、叶梦得《春秋考》卷三、郑樵《通志·六经奥论》、《论语·公冶长篇》朱熹《集注》引程子说、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五》、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皆从之。

五为左丘明子孙或门人所作说,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纲领·评三传下》:“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

六为春秋战国之际(前453年)魏左子所作说,见清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左传》终于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距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义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于孔子者明甚。……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昭、襄之际,文词繁复,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七为左丘明之后屡有附益说,清姚鼐《左传补注序》:“《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吴起始仕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说大同。

八为西汉成帝、哀帝之世(前32年—前1年)刘歆续作说,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一:“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康有为《新学伪

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从之。

九为战国中期魏吴起(前440年—前381年)续作说,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日]狩野直喜《左氏辨》说大同。

十为战国中期魏吴起(前440年—前381年)所作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邱明之说也。……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①

十一为魏武侯二十一年(前375年)至魏惠王十九年(前351年)之间子夏再传弟子所作说,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前351年,也是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岁,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②寇养厚《关于‘〈春秋〉三传’的两个问题》从之。^③

十二为魏文侯四十三年(前403年)至魏武侯七年(前389年)之间所作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综上所述,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9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④

十三为战国初期魏国儒士所作说,杨宽《战国史》:“从《左传》的内容看来,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学者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官记载,加以整理编辑而成。”^⑤

十四为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前孔子亲作说,姚曼波《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三证孔子作“春秋传”》:“《左传》在思想倾向、细节描写、语言风格、措辞用字等方面大多盖有孔子的烙印,因而,笔者推断,《左传》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页221—225,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②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③ 寇养厚:《关于‘〈春秋〉三传’的两个问题》,《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页69—74。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页41,中华书局,1990年。

⑤ 杨宽:《战国史》,页5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主体部分为孔子所作。《左传》与《论语》的‘心心相印’互为表里，正说明《春秋》（‘传’）是孔子‘以史显志’之书。正因如此，孔子也有‘知我’‘罪我’之叹。”其《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补证》、《从汉初学坛探考“孔春秋”》皆力主此说。^①

上述诸说以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后左丘明所作说近古，其余见解可为一家之言，然皆无确证，乃推测之说。故笔者以为太史公说近是。兹补证如下：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②则《左氏春秋》早在楚威王（前339年—前329年在位）时期已成书并广为流传。据此我们认为，《左氏春秋》纪事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即孔子卒后十一年，此为其成书年代之上限。又，鲁哀公二十七年后记有“悼之四年”（前464年）晋荀瑶（知伯）围郑辱赵孟（赵襄子无恤）之事，本条结尾有“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甚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悛，故韩、魏反而丧之”诸语，此即指悼公十三年（前453年）赵、汉、魏三家灭知氏分晋之事。^③试想，《左氏春秋》所记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期间绝无纪事年代阙如者，那么，鲁悼公元年至三年之事皆未记叙，中间突兀插叙四年晋荀瑶（知伯）围郑辱赵孟（赵襄子无恤）一事，且本条又探后记叙了悼公十三年（前453年）赵、汉、魏三家灭知氏分晋之事，体例与前文绝不相类，自然非《左氏春秋》作者原文，显然为后人附记文字。但正是本条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左氏春秋》成书年代之下限。因此，《左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在鲁悼公元年（前467年）至十三年（前453年）之间。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

其一，左丘明年辈较孔子晚。

关于左丘明其人，自汉以降主要有二说：一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之“鲁君子左丘明”与《论语·公冶长篇》之“左丘明”为同一人说，即左丘明与孔子同时而年辈与七十子相当，《论语·公冶长篇》魏何晏《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左丘明，鲁大史。”许慎《说文解字·序》：“至孔子书

① 姚曼波：《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姚曼波：《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补证》，《文献》，1994年第3期；姚曼波：《从汉初学坛探考“孔春秋”》，《文献》，1995年第3期；姚曼波：《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三证孔子作“春秋传”》，《文献》，1999年第1期。

② 此所谓《春秋》，即《左氏春秋》，亦即《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铎氏微》三篇，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铎氏微》”。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1736）认为，“此皆战国时事，《左传》叙之者，终陈恒之言耳”。案：此乃附记者“终陈恒之言”，而非原作者“终陈恒之言”。

《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唐刘知幾《史通·外篇·申左》：“《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宋王观国《学林》卷一、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纲领·评三传下》、郑方坤《经稗·左丘明》及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皆从之。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三申之曰：“《汉·艺文志》，《左氏传》、《国语》皆鲁太史左丘明著。《司马迁传》：‘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复纂异同为《国语》。’而刘向、刘歆、杜预辈皆言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侔也。’其曰：‘好恶与圣人同’，则明指《论语》‘左丘明耻之’诸句。”朱彝尊《经义考·春秋二》、《春秋九》、《春秋二十三》、《春秋三十八》说同。二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鲁君子左丘明”与《论语·公冶长篇》之“左丘明”非同一人说，即左丘明为孔子以前之贤人，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啖助传》、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三并引啖助之言曰：“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邱明为其人。……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①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引王安石《春秋解》、叶梦得《春秋考》卷三、郑樵《通志·六经奥论》、《论语·公冶长篇》朱熹《集注》引程子说、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五》、明卓尔康《春秋辨义·卷首四》、清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皆从之。笔者以为，唐啖助、赵匡、陆德明、陆淳之说与《史记》、《汉书》、《后汉书》说乖戾，皆无确证，乃推测之辞。故此从汉孔安国《论语训解》说。

其二，左丘明年辈与子夏（卜商）、曾子（曾参）大致相当。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左传序》引刘向《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① 此据《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引文，《新唐书·啖助传》、《直斋书录题解》卷三引文较略而异。

卷八、明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胡燏《拾遗录》、清毛奇龄《四书剩言》卷一、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卷下、朱彝尊《经义考·承师二》、《曝书亭集·孔子门人考》皆从之。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谓吴起之师“曾子”，即《别录》之“曾申”。^①《汉书·刘歆传》：“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则左丘明与子夏（卜商）、曾子（曾参）等同为孔子晚辈弟子，而吴起为左丘明的再传弟子，其比左丘明晚两辈。左丘明与卜商、曾参等年岁大致相当，其撰写《左氏春秋》时当为四五十岁，正为从事写作之盛年。^②

其三，左丘明为孔子后辈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俱未载左丘明其名，《汉书·刘歆传》：“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晋杜预《春秋左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晋书·杜预传》、《荀崧传》说大同。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申之曰：“《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清朱彝尊《经义考·承师一》亦申之曰：“鲁太史左丘子明，唐贞观十三年诏与颜渊同从祀庙庭，宋祥符中赠瑕丘伯，政和中改赠中都伯。按：左氏为孔子弟子，主其说者众矣。谓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者，严彭祖也；谓左丘明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者，刘歆也；谓仲尼与丘明观鲁《史记》，有所褒贬，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者，班固也；谓《左氏传》理长，至明、至切、至直、至顺，长于二《传》者，贾逵也；谓《春秋》诸家去孔子远，《左氏传》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实者，王充也；谓丘明之《传》囊括《古今表》里人事者，卢植也；谓丘明受《经》于仲尼，杜预也；谓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亲受者，荀崧也；谓丘明之《传》，释孔氏之《经》，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者，孔颖达也；谓左丘躬为鲁史，受《经》于仲尼者，刘知幾也；

① 据《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论语·先进篇》魏何晏《集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骃《集解》并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论语·学而篇》何晏《集解》引[汉]马融《论语训说》、《礼记·檀弓上》郑《注》、《孟子·尽心下》赵《注》、[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申，曾点（曾皙）之孙，曾参（子舆）之子，曾元之弟，卜商（子夏）弟子；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则其生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卒于魏文侯十一年（前436年）。据此，则《孙子吴起列传》之“曾子”，与《礼记·檀弓上》之“曾子”为同一人，当即曾参之子曾申。

②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卜商生于鲁定公三年（前507年），曾参生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

谓左氏受《经》于仲尼，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万代之下见其本末、比余，《传》功最高者，谈助也；谓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经》，丘明受仲尼之《经》而为《传》者，权德舆也；谓孔氏之门，左氏富而不诬，有以见圣贤之心者，刘轺也；谓丘明与圣人同时，接其闻，见参求，其长左氏为上者，陈岳也。盖自唐以前诸儒之论，皆以丘明受业孔门。”《曝书亭集·孔子弟子考》说同。笔者以为朱氏说甚辩，故此从之。关于左氏、丘氏、左丘氏之所出，宋陈彭年等《广韵·十八尤》、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资治通鉴·魏纪十》胡三省《音注》、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八尤》“丘”字注并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丘氏）鲁左丘明之后。”①《急就篇》卷二颜《注》：“（左氏）左丘明，本鲁之左史，继守其职，遂为姓焉。”林宝《元和姓纂·三十三豈》说大同，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一从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三十三豈》：“左丘，……左丘明之后。”②笔者此亦从之。

综上所述，左丘明，氏左，其后别为丘氏、左丘氏，名丘明，鲁太史，孔子后辈弟子，曾申之师，世系及生卒年皆不详，大致与孔子同时而年辈较孔子晚。左丘明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采，为春秋晚期著名史学家与文学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国语》（《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篇。③其中，《左氏春秋》成书于鲁悼公元年（前467年）至十三年（前453年）之间。④

3. 《左氏春秋》的基本特征

成公十四年《左传》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左传》载君

①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广韵·十八尤》‘丘’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案：俞氏认为左丘明者，左其官，丘其氏，明其名。然据应劭说，丘氏乃左丘明子孙之别氏，而非左丘明自己氏丘，故俞氏说误。又，[清]段玉裁《经韵楼集·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认为，丘氏非左丘明后，与应劭说异，说似无确证。

② [清]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卷下：“左邱，其氏也；明，其名也。”朱彝尊《经义考·春秋二》、《曝书亭集·孔子弟子传》说同。案：此以左丘明氏左邱，为复姓，笔者不取。

③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颜氏家训》皆谓左丘明作《世本》，未详何据。左丘明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从祀孔子，北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赠取丘伯，徽宗政和元年（1111）改赠中都伯。

④ 说详：邵炳军《〈左氏春秋〉为左丘明于鲁悼公之世成书说》，待刊。

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此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也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春秋》笔法”的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基本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外延：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尚简用晦是“《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的美刺效果。^①《春秋》为《左氏春秋》所依据的重要文献之一，且《左氏春秋》作者两次称引前人关于“《春秋》笔法”之论，其在撰写《左氏春秋》时必然要受到《春秋》的启发与影响。因此，汉刘歆、晋杜预、唐刘知幾等在论及《左氏春秋》的基本特征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汉书·刘歆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外篇·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大史，博总群书，至如棊枰、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

^① 参见：李州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页91—98。

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上文所引《移太常博士书》所谓“皆有征验，外内相应”，《春秋左氏传序》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等“例之五情”，《史通·外篇·申左》所谓“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凡所采摭，实广闻见”等所谓《左氏春秋》之“三长”，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三《传》各自的编撰体例及其基本特征，深得三《传》之旨。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左氏》、明卓尔康《春秋辩义·传义》、唐顺之《稗编·春秋三·论三传》、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先正评说》、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四、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及吕思勉《经子解题》皆从之。

4. 《左氏春秋》的思想内容

《左氏春秋》内容丰富，忠于史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评人论事中，也体现出作者进步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天人关系上，重视人的作用。殷商以来，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并成了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西周末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天或上帝、神支配一切的观念开始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思想，即认为“天道”不能干预或者不能完全干预人事，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左传》作者通过一些历史故事，较明显地表现了它对后一种进步思想的肯定。如桓公六年《左传》所载随大夫季梁劝谏随侯要“修政而亲兄弟之国”以战胜楚武王伐随，而不要试图以大举祀神的做法来阻止楚武王伐随。又如昭公十八年《左传》所载郑国主持政事的子产反对裨灶用宝物祭神以禳除火灾的主张。

二是在君民关系上，重视民的作用。如昭公三十二年、二十五年《左传》所载鲁国大臣季氏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鲁国的政权，而鲁昭公却因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国。又如襄公十四年《左传》所载卫献公不能“养民如子”，卫人终于将这位“困民之主”赶下了台。

三是褒扬对国家有贡献的各类人物。既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很有成就的诸侯国君，又有齐管仲、晏婴、晋赵盾、叔向、郑子产等颇有作为的卿大夫；既有处于社会底层的舆人，又有积极参与国事的商人。《左传》在记载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过程中，都表现了作者对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扬。

四是揭露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和荒淫无耻。如僖公十九年《左传》所载宋襄公用曾子于次睢之社(即人殉),又如文公六年《左传》所载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借此严厉谴责他们的“弃民”、“残民”行为,体现了“不隐恶”的史家精神。

当然,《左传》一书的内容和思想也是复杂的,它在不少地方宣扬了封建道德思想和宿命论的观点,但从全书的基本倾向来看,这些消极的东西还是属于次要的。

5. 《左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所谓“《春秋》笔法”的文法形态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与文学创作手法,从“《春秋》笔法”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并蕴涵在经法与史法之中。如果说经法乃惩恶劝善、经邦济世之原则和法度,那么文法乃昭示经法与史法之原则与法度的修辞载体。也就是说,经法、史法所蕴涵的深刻义理是通过文法的修辞形式来实现的。左丘明继承并发展了“《春秋》笔法”文法形态,自觉关注并运用其文学性与艺术性特征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中,开创了属辞比事之体,其文学成就深为后人所赞许。唐刘知幾《史通·内篇·六家》认为,“其(指《左传》)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梁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指出:“《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谨严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事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曲聱牙之病,颇易诵习。”的确,《左传》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从文学角度看,也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左传》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左传》记事总能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而不是毫无选择,平铺直叙。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左传》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时间既长,故事情节又非常复杂,而选材布局均极恰当。作者以重耳活动为中心,精选能突出中心的事件,正叙、侧叙等交叉运用,写得详略有致,生动活泼。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生活情节